

宋代理学精神与宋词境界的开创

王晓骊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宋代理学是宋词雅化的重要哲学背景,理学精神着眼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对社会文化心理和士大夫人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宋词中崇高境界、和乐境界和醇厚境界的开创受到了“养浩然之气”、“寻孔颜乐处”和“民胞物与”等理学思想的影响。这三种境界的开创改变了词轻艳浮薄的单一风格,加深了词的思想内涵,极大地提高了词品。

关键词:宋词;理学精神;境界

中图分类号: I 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07)05-0107-05

宋代理学是儒家文化自两汉以来的又一个发展高峰。理学兴盛于北宋中叶,与宋词的繁荣几乎同时。在词风盛行、理学昌盛的宋代,文人(尤其是南宋文人)大多既有作词的经历,又或多或少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有的词人本身就是理学家,如朱熹、魏了翁等;有的受理学濡染颇深,如吕本中、杨万里、刘克庄、沈义父等;有的与理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苏轼、张孝祥、辛弃疾等……可见作为宋词发展的哲学背景,理学对宋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通行于词学界的看法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对宋词的影响几乎难以找出什么积极的东西,理学对词带来的只有质木迂腐的头巾气。实际上,理学词的失败并不能归咎于理学,因为用文学的形式来谈哲学,本身就是一种错位。任何一种哲学对文学的影响都必须以人为中介,它首先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然后才进一步作用于文学创作。理学精神着眼于对人生境界的提升,对宋代社会文化心理和士大夫人格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宋词的角度而言,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云:“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如果说早期曲子词重在对现实人生和

欲望的自然表达,那么,北宋中期以后词的发展就是向邻于理想的状态不断努力,换言之,宋词从市井文学逐渐文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境界提升的过程,是一个从形而下的声色世界逐渐走向自由自觉的理性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学无疑是文人最易于也是最乐于援引的哲学思想,更何况理学本身就具有审美的特征:理学作为传统美学的发展者,其贡献“表现在心性思索所建造的形上本体上。这个本体不是神,也不是道德,而是‘天地境界’,即审美的人生境界。”^{[1](P224)}本文即旨在探讨宋词“境界”的开创与宋代理学精神的关系。

一、“养浩然之气”与宋词中的崇高境界

在宋词的雅化过程中,境界的开拓是其实质性的转变。对于这一转变,南宋理学家胡寅曾经作过极为精当的描述: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

收稿日期 2007-06-12

作者简介:王晓骊(1970—),女,江苏苏州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唐宋词研究。

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2](P595)

苏轼对文人词发展的贡献正在于他将自我对高尚人格境界的企望融入了词的创作,从而开创了宋词审美中的崇高境界。崇高的艺术境界来自于崇高的人格境界,作为理学家的胡寅对苏词的评价中透露出来的正是理学精神与词学审美追求的一致性;即宋词艺术的崇高美首先来自于“浩然人格”的涵养。这种一致性不仅在于理学家作为接受者对苏词的单方面的阐释,更在于苏词的崇高之境中本身就凝聚着对人格美的追求。

苏轼所代表的蜀学在政治见解上与洛学分歧颇大,但蜀洛党人之间多有交往,比如与苏轼交厚的鲜于子骏就曾问道于程颐^[3](P395);苏轼本人对理学前贤的人格也表现出由衷的崇敬之意,他曾写诗称颂周敦颐的人品^[4](P108)。而在个人的人格建树上,苏轼兄弟与理学中人并无不同,即均以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人格理想,并进一步将这一人格追求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了一起,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云: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5]

苏辙认为文章境界的开拓和提升并不是靠学习,而是通过人格之气的涵养获得的。如果说苏辙的观点仅限于文章,那么其兄苏轼就把这一文艺思想融合进了宋词的创作,试以《水调歌头·快哉亭作》为例: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开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敲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此词创作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其时苏轼因“乌台诗祸”谪居黄州。在四年多的贬谪生活中,佛老思想固然是支持词人度过人生困境的精神依托,但儒家“养浩然之气”的人格追求却是词人坚持自我操守和自我肯定的保障。苏轼曾自述“穷不忘道,老而能学”^[6](P365);又云:“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7](P150)词人在黄州期

间所形成的词风,前人或称之为豪放、或誉之为清雄,而从现代美学的角度则都属于崇高的范畴。这首《水调歌头》正是以江天之景为描写对象,审美客体本身就具有雄奇壮美的特点。而词作又把自然界的千里长风与人的浩然正气联系在一起,从而寄予了正直、坚韧和旷达相结合的理想人格目标。

南渡以后,随着宋词的高度文人化和理学思想对宋词创作的渗透,词人们走上了人品与词品相结合的道路,以养浩然之气为底蕴的崇高美成为宋词重要的审美追求,如:

秋到天空阔,浩气与云浮。(吴潜《水调歌头》)

真乐谁能识,兀坐忘言,浩然天地之中。(赵师侠《促拍满路花》)

素养浩然之气,铁石心肠谁拟。(冯熔《如梦令》)

浩然心在,我逢著、梅花便说。(蒋捷《尾犯》)

同时由于宋人对“浩然之气”的理解更多地偏向于“光风霁月”的磊落襟怀,月明风清的江水便成为他们磨砺高洁人格,寄托人生理想的最佳环境和媒介,宋代词人因此特别偏爱澄净空阔的水光月色。如张孝祥的名作《念奴娇》(洞庭青草)便为人们构建了由空阔的水面与明净的月光相映照而组成的空灵意境,折射出词人们浩然与澄澈相结合的人格追求,从而形成了宋词崇高美的独特表现形态。

二、“寻孔颜乐处”与宋词中的和乐境界

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少年时从学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8](P16)。从此以后,“寻孔颜乐处”就成了宋代儒学家的重要哲学课题,同时也是他们求索终生的人生课题。所谓“孔颜乐处”,语出于《论语》: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孔颜乐处”是超越人生功利、道充身安的“圣贤气象”;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则是“浑然与物同体”的“和乐境界”。所谓“和乐”,张载

云:“和乐,道之端也。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9](P42)。“和乐”是一种存于人伦日用又超越于现实之上,出于道德追求又入于情感愉悦的理想境界。对“和乐”境界的追求并不仅限于理学家,它同时也是宋代文人的普遍文化追求。以“道充”为价值指向,以“和乐”为情感基础,宋代文人不但借此自濯于世俗羁绊之中,还可以超拔于“人生如梦”的灰暗呓语之上,于影响文学创作,正如北宋张耒所云:

士方其退于燕闲寂寞之境,而有以自乐其乐者,往往英奇秀发之气,发为文字言语,超然自放于尘垢之外,盖有可叹者。然一行为吏,此事便废。……俗虑日进,道心日销。^[10]

唯有“道心”才能屏除“俗虑”,才能在寂寞之中“自乐其乐”,才能有“英奇秀发之气”,才能有超然于尘垢之外的文字言语。在张耒的上述阐述中,明显包含着道德履践、情感体验和文学创作三位一体的意思。这一文学观在宋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而检视宋词,其实也不乏这样的“和乐”之作。如黄庭坚的《画堂春》词云:

摩围小隐枕蛮江,蛛丝闲锁晴窗。水风山影上修廊,不到晚来凉。相伴蝶穿花径,独飞鸥舞溪光。不因送客下绳床,添火注炉香。

此词作于黄庭坚贬居黔州期间,摩围山即位于黔州城西。黄庭坚在学术上师从李常、孙觉,《宋元学案》以他为“诗人而入学派”的典型。在文学上,他的观点与道学家也最为相似: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11]

这与道学家邵雍反对诗人“溺于情好”的观点完全一致,对于黄庭坚来说,正是在“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信念的支持下,贬谪中的词人才没有沉溺于哀苦凄凉之中,而是在山光水影、蝶飞鸥舞中领略了生命的另一重意义,对此理学家魏了翁曾这样评价:“以草木文章,发帝机杼。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12]。

“和乐”境界的追求也影响了辛弃疾后期的创作。稼轩与理学家朱熹交往颇多,朱熹对辛弃疾甚为推许,且屡以“克己复礼”、“向里用心”相期,辛弃疾后期思想因此受到了理学的影响。而最能打动词人的,就是理学家所标榜的“和乐”境界。他曾以“瓢泉”命名新居,其意正在于学习颜子箪食瓢饮而不

改其乐的境界。他还以北宋道学家邵雍为榜样,试图寻求心灵的“安乐窝”:

贤愚相去,算其间能几。差以毫厘缪千里。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孳孳者,等是鸡鸣而起。味甘终易坏,岁晚还知,君子之交淡如水。一饷聚飞蚊,其响如雷;深自觉昨非今是。羨安乐窝中泰和汤,更剧饮无过,半醺而已。(《洞仙歌》)

据《宋史》记载,邵雍至洛阳,“蓬荜环堵,不芘风雨”,“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13](P12727)邵雍式的“安乐逍遥”是以道德追求为底蕴的“孔颜乐处”的现实体现。这首《洞仙歌》是辛弃疾的绝笔,正可看作是他对自我人生的总结。词人一生陷于失意的焦虑悲愤之中,虽未能真正有过“和乐”的心境,但却是他一直追求的人生境界。

宋词中的“和乐”境界实现了人生、哲学和文学的三位一体,不仅成功完成了哲学与人生的审美化转换,也给词这种娱乐文学添注了丰厚的内蕴。“和乐”的平淡之中包含了对至善之“道”的体悟和以理遣情的理性色彩。以朱熹的《西江月》为例:

堂下水浮新绿,门前树长交枝。晚凉快写一篇诗,不说人间忧喜。身老心闲益壮,形臞道胜还肥。软轮加壁未应迟,莫道前非今是。

词人与所有人一样也感受着人间之忧喜、生命之忧患,但是对“道”的领悟却使之能在自然的生机中体认到自我的生命意义,从而超然于这些人生困窘之上,正所谓“身心无累久轻安”(朱熹《西江月》)。词作闲适而不颓丧,充溢着因“道胜”带来的和悦之意,自有其价值所在。

从艺术角度而言,宋词中的“和乐”境界是对传统“中庸”审美理想的回归,体现出与理学诗相一致的平淡圆融之美。“和乐”之词从内容而言,多表现平淡的日常生活;从语言而言,大多清新浅易,多用口语;从情感的表达而言,多以平淡出之,很少大起大落的情感流程。以吕本中的《满江红》为例:

东里先生,家何在、山阴溪曲。对一川平野,数间茅屋。昨夜冈头新雨过,门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桥、回合柳参天,摇新绿。疏篱下,丛丛菊。虚檐外,萧萧竹。叹古今得失,是非荣辱。须信人生归去好,世间万事何时足。问此春、春酝酒何如,今朝熟。

词作所写,为生活中的习见之景和平常之感,又完全以白话出之,通俗易懂,情调淡泊冲和,正体现了“乐而不淫”的诗教传统。

三、“民胞物与”与宋词中的醇厚境界

后人常因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过激之语而误以为理学家都是寡情之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理学思想所提倡的不是出于一己私念私心的欲望,而是去小我存大我,万物皆备于我的博大情怀。张载曾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4](P62),有此“民胞物与”的精神则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才能建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5](P376)的宏大理想。程颐曾特别标举《中庸》中的“鸢鱼之乐”:“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16](P59),从而赋予理学的“道充”境界以活泼的生命力和自由洒落的精神享受。周敦儒不除窗前之草,以为与自家意思一样,邵雍春日出游,以观万物之生趣,都体现了他们对生命本身的体认和珍惜。钱钟书先生曾指出:“盖宋儒论道,最重活泼泼生计,所谓乾也、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也,皆指此而言。春即其运行流露也。”^[17](P230)。博大宽厚的生命情怀造就了醇厚的文学境界:生意盎然而又亲切平和。

宋词醇厚境界的出现同样始自苏轼。苏轼为人宅心仁厚,据宋人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18]词人忠厚博爱的胸襟,赋予其词亲切醇厚的品格,如: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浣溪沙》)

而苏轼词中最典型的醇厚之境莫过于下面这首《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

蝉鸣草衰,白鸟翻空,红蕖照水,万物各得其所,莫不适性,则天地之间莫非生意。词人在体味自然之本性的同时,也感受到自我作为生命存在的价值,从而领会了给予自己和一切生命体以终极意义的大自然的生生之德。这首词立意天然,出语平淡,却意蕴丰厚,正是一片天籁之声。晚清刘熙载《艺概·词概》曾以“温柔敦厚”^[19](P3693)四字概括苏轼之词,陈廷焯也屡称苏轼之“忠厚”^[20](P3783),着眼点正在此醇厚之境。

厚之境。

宋室南渡以后,随着理学的不断发展成熟,苏轼的醇厚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并普遍接受,醇厚之境也成为宋词创作中的重要追求。一方面,词人的人文关怀精神渗透入词,充实了词作为文人文学的情感积淀,形成了醇厚境界的内在张力。如张孝祥创作《念奴娇·过洞庭》,“尝舟过洞庭,月照龙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制词,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21](P57)这与程颐不愿乘轿,反对雇乳母的动机何其相似。张孝祥与理学家朱熹、张栻有很深的交往,他的思想无疑受到了理学的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在宋人看来,最能体现天地生生之德的莫过于山水自然,“儒家自孔子、曾皙以还,皆以怡情于山水花柳为得道”^[17](P238),宋代文人还建立了对山水文学的特殊解读方式。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八曰:“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暖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上两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两句见万物莫不适性。”罗大经从杜甫的写景诗中读出了天地间的生意和万物各得其所的适意,而这正是诗人生命情怀的表现,也是“天理”流行的自然体现,正所谓山水体道,而诗人则目击道存。山水自然因此成为宋人青睐的题材,词的创作也概莫能外。词人们在自然山水中体味着乾坤的造化之心,体味着天人合一而生意浩然的独特乐趣:

今日山头云欲举。青蛟素凤移时舞。行到石桥闻细雨。听还住。风吹却过溪西去。我欲寻诗宽久旅。桃花落尽着无所。渺渺篮舆穿翠楚。悠然处。高林忽送黄鹂语。(陈与义《渔家傲》)

山行逢雨,春去花落,原本是让人心恼肠断的不如意之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山雨将来却风吹而过、桃花落尽却有黄鹂高鸣,跳出了一己之得失,也就不在意自然界的风雨春秋。词人们之所以能在平淡乃至琐碎的日常生活或隐居生活中寻找到乐趣,就在于他们把自我的生命融入到了自然万物之中,星转斗移、花开叶落、鸢飞鱼跃、水落石出无一不是“道”的体现。具有形上意义的“道”因此得以与生命意识相融合,“把本来说得极高、极大的‘天命人性’、道德法则、伦常秩序,最终又归结到充满感性血肉的心理情感的依据上,这也就使其为引证伦理本体而设定的整个宇宙论、世界观,也带有人情化、生命化的意味”^[22](P224)。

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缺少开疆拓土的热情,但是却集中表现出对高尚醇厚人格的企及;宋代文人

对外在世界的把握也以“格物致知”式的冷静取代了宗教式的狂热。不管是人生价值取向的转移还是把握世界方式的改变,都深深打上了理学精神的烙印。无论后人如何评价理学的是非功过,它对宋代士人文化心理的改造之力都是不能否认的。曲子词起于城市市井,沾染了较深的“市民气”。词从士大夫文化边缘逐渐中心化的过程,不仅需要艺术形式的雅化,更需要脱胎换骨般的文化改造。理学精神对宋词创作和接受领域的渗透无疑可以淘洗和置换词从母体带来的“异质因子”,从而加速文人词的雅化。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 [2] 胡寅.酒边集序[M].吴讷.百家词[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2.
- [3]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M]卷第七.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 谭松林、尹红整理.周敦颐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
- [5]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栾城集[M].卷二十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书店,1985.
- [6] 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苏东坡全集上[M].北京:中国书店,1986.
- [7] 苏轼.与李公择.苏东坡全集下[M].北京:中国书店,1986.
- [8]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M]卷第二上.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9] 张伯行.濂洛关闽书[M]卷二.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0] 张耒.许大方诗集序.张右史文集[M]卷五十一.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书店,1985.
- [11] 黄庭坚.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豫章黄先生文集[M]卷二十六.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书店,1985.
- [12] 魏了翁.黄太史文集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M]卷五十三.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书店,1985.
- [13] 脱脱等.宋史[M]卷四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5] 张载.近思录拾遗.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6]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A].二程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7]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8] 高文虎.蓼花洲闲录[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9] 刘熙载.词概[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0]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A]卷八.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1]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乙集.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22]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向春】

On the Spirit of Song Neo-Confucianism and Exploration of the Realm of Song Lyrics

WANG Xiao-li

(The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Song Neo-Confucianism constitutes the backdrop against which Song lyrics evolved. Song Neo-Confucianism focuses on the uplifting of human domain, which plays an indelible role in reshaping socio-cultural mentality and personality of literati at that time. Poetic exploration of the sublime, harmonious and mellow realms go on under the impact of Neo-Confucian ideas, which works to change the monolithic style with frivolous and coquettish expression, thus adding weight and substance to Song lyrics.

Key words: Song lyrics; the spirit of Neo-Confucianism; realm